

蔡元培的北大改革與 大學精神的塑造

• 應 星

大學體制是由洋務派以「自強」為目的而從國外移植進中國的一項新制度。大學作為一國最高的文化教育機構，要考慮如何保存和發揚本國文化傳統，避免淪為西方學術的附庸。蔡氏「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八字方針，是北大當年改革的要害所在。北大的全面改造，為中國打開了盛況空前的學術局面。

雖然中國的高等教育源遠流長，西漢即開始設立太學、北宋起開始書院講學，但大學體制是由洋務派以「自強」為目的而從國外移植進中國的一項新制度。因此，要考察中國的大學精神，首先就要考察西方大學精神的核心——學術自由^①是如何逐漸在中國的大學體制中被培植起來的。

不過，既然中西文化在發展路向上有着相當大的差異，既然移植的目標最後要落實在「自強」上，那麼，大學作為一國最高的文化教育機構，就不可能不考慮如何吸納、保存和發揚本國文化傳統以及如何培植文化自主性的問題。因此，塑造中國大學精神的現代實踐的另一個重要面向就是如何避免淪為西方學術附庸的困境。積極引入學術自由的理念與努力追求學術獨立理想，這就是蔡元培、張伯苓和蔣夢麟、胡適、梅貽琦那兩代教育家塑造大學精神上所共同面對的兩大問題。

蔡元培在中國有「教育神」之稱，談中國大學精神的塑造，必然要從蔡元培談起。蔡元培在1917年至1923年^②

對北京大學的全面改造，為中國打開了一個氣勢宏大、盛況空前的學術局面，為塑造中國自己的大學精神和締造中國自己的學術新傳統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大家都習慣於把打開這個局面的根源歸結為蔡元培所說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這八字方針的確是北大當年改革的要害所在。但要真正揭開蔡元培治下的北大能夠在全國開思想新風、立學術新路的奧秘，最重要的並不在於蔡元培對這八字方針的字面賦義，而在於洞悉其實際運作過程。也就是說，我們對北大當年改革的理解，不能僅僅盯住改革者宏大的教育理念和理想的制度設計，更需要關注在此過程中發生的種種事件，由此才能看到制度本身是如何想和如何做的。也正是借助具體而複雜的事件分析，我們才可能將實現學術自由的外部條件和內在限度展露出來，將學術自由與學術獨立之間的關係勾連起來。本文即以蔡元培對北大的改革為中心，對北大1949年前塑造中國大學精神的實踐過程進行一個初步的考察。

一 外部環境與蔡元培的北大改革

時下對蔡元培改革北大的研究多注目於北大的內部改造。但如果北大的改革缺乏大學自治的外部環境，則學術自由的內部建設成果就難以得到真正的保障。我們可以注意到，儘管蔡元培在當時聲望極高，但他在十年的北大校長任內曾八度請辭（1917年7月；1918年5月；1919年5月；1919年12月；1922年8月；1922年10月；1923年1月；1926年7月），前七次均發生在他實際主持北大校務的時期，平均不到一年就請辭一次。陳獨秀曾經批評蔡元培的辭職之舉只是抗議政府腐敗的消極做法，但這種說法失之簡單。蔡元培曾自述作事「必先審其可能與不可能，應為與不應為，然後定其舉止」^③。他的辭職並非輕率之舉，而是對大學與政治的關係中可能與不可能、應為與不應為的審慎考慮。他的請辭既是這些外部關係作用於大學的結果，同時又是他用以調整這些關係的基本手段。我們對塑造北大精神傳統的外部關係的研究，也許正可以從研究蔡元培的請辭這個特殊的角度着手。

1、大學與政治干預

蔡元培在1917年就任北大校長的演說中就開宗明義地宣稱：「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這席演講雖然名為對北大學生求學宗旨的校正，實際上也提出了大學本身與政治的關係。蔡元培認為大學既然是純粹傳授和研究學問的地方，那麼，盡可能地防止政治干預就是大學實現學術自由最重要的外部基礎。

蔡元培請辭最堅決的一次是五四

運動發生後。1919年5月的這次請辭成因甚為複雜。蔡元培除了以此表示對學生運動甘負責任之外，他在出京時還專門貼了一則著名的啟事，引用「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汙可小休」來表示他的積勞生倦之意。同年6月15日，蔡元培又特地發表了一個「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言明他的倦意主要是來自政治對大學的橫加干預。在蔡元培看來，這種干預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行政干預，另一個方面是政治干預。所謂行政干預，指的是大學校長成為由政府任命的半個官僚，大學與教育部被處理成官僚隸屬關係，因此，大學內部的大小管理事務稍微破例，就必須呈報教育部批准。所謂政治干預，指的是大學缺乏保障思想自由的外部環境。蔡元培痛陳他絕對不能再作政府任命的大學校長，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

後來由於各方的一再挽留，蔡元培才不得不答應回任校長。這次請辭風波並沒有改變大學校長由政府任命的體制，但蔡元培還是從三個途徑來盡可能地削減政治對大學的干預：

第一個途徑是蔡元培用他個人極為特殊的社會地位，來為北大在相當程度上贏得自治權。這一條實際上是在此次辭職前就一直在被運用並頗為見效的。蔡元培作為前清翰林、德國留學生、老革命黨人、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他的這些文化、政治和歷史光環使他的大學理念和主張難以被一般的政治人物所撼動。蔡元培所痛苦的倒不是他所推行的改革受到了實際上的阻隔，而是他根本就不認同這些政治干預的正當性。為此，蔡元培還從內外的制度設計上來謀求大學的自治，這即下面的兩個途徑。

蔡元培在十年的北大校長任內曾八度請辭，陳獨秀曾經批評蔡氏辭職之舉只是抗議政府腐敗的消極做法。但蔡氏的辭職其實並非輕率，而是對大學與政治的關係中可能與不可能、應為與不應為的審慎考慮。在蔡元培看來，干預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行政干預，另一個方面是政治干預。

蔡元培堅決反對政治對大學自治的干預，但不等於政府不需要對大學有任何作為。政府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為大學提供充足經費。蔡元培和蔣夢麟等人1923年曾提出辦大學有「三要」：圖書儀器要豐富；教授待遇要優厚；學術自由要保障。另外他的遠見卓識還表現在不把辦大學最後的寶押在爭取政府的經費支持上。

第二個途徑是蔡元培在校內加快推行教授治校。在此次辭職前，蔡元培已經推行了校評議會和系教授會制度，前者是給教授代表和各科學長以校內立法和作出重大決策的權力，後者是由教授來推舉系主任、決定教務。在1919年9月回任北大校長時的演說中，他進一步提出要組織行政會議，使行政事務也採取合議制。而後蔡元培又在北大設置教務長和總務長，分管教學和事務，而這二職均以推選方式在教授中產生。這樣一來，無論政府任命甚麼樣的人來當校長，其權力已經被大大削弱，無法任意辦事。

第三個途徑是蔡元培進一步企望在外部制度上確保大學的自治。他在1922年的〈教育獨立議〉中系統地提出了他的設想，認為大學的教育事業應該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教會的影響。因為教育的邏輯既與政黨的邏輯不同，也與教會的邏輯相異。就教育與政黨而言，政黨求近功，而教育求遠效；就教育與教會而言，教會是保守的，而教育是自由的。因此，大學的管理就必須按照教育本身的邏輯來進行。為此，蔡元培提出了一個系統的改革方案，如大學校長由大學教授組成的委員會推選，教育部不得干涉大學內部事務，教育總長一職的任命反而必須得到大學校長組成的高等教育會議承認，等等。這個改革方案在他後來任大學院院長時得以推行。

1926年7月蔡元培因為北洋軍閥派兵搜查北大書報處和進校大肆搜捕進步人士而請辭，再次表達了他這樣的信念：獨立和自由是一所有尊嚴、有精神、有德性的大學的生命所在。只要政治對大學橫加的干預不止，他就不會願意委身在這樣的大學中。

2、大學與經濟保障

蔡元培堅決反對政治對大學自治的干預，當然不等於說不需要政府對大學有任何作為。對於國立大學來說，政府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為大學提供充足的辦學經費。如果說蔡元培上述請辭多出於擺脫不自由狀態的真誠退意的話，那麼，他1922年8月因為大學經濟保障問題而聯合北京其他七所國立大學校長的請辭就更多是以退為進的鬥爭手段了。

當時政府積欠北京國立八所大學的教育經費均在五個月以上。當校方代表到交通部索薪時還備受侮辱，而教育部也只是空言塞責，因此，蔡元培等八校校長堅持如果在開學前不發給各校三個月的經費，則一併辭職。雖然政府一再敷衍，但蔡元培等人仍堅持不鬆口。最後，政府不得不同意撥給兩個月費用，並答應在當年9月底以前再發半個月。

1923年4月，北京國立八校再次爆發欠薪危機。在索薪危機爆發後，蔡元培意識到這樣的索薪或請辭並不是解決經濟問題的根本辦法。他認為不能把辦教育的最後希望寄托在政治上尤其是瀕臨崩潰破產的政府，蔡元培自己提出的辦法是使國立八校脫離與北京當局的關係，另組董事會，由董事會來籌措資金。不過，無論是就當時的政治形勢還是民間經濟實力而言，蔡元培想使大學徹底擺脫對政府的經費依賴的努力都並不現實，但我們看到他的辦學實踐中很有遠見卓識的一點就是，不把辦大學最後的寶押在爭取政府的經費支持上。作為一個國立大學校長，當然也應該為爭取基本的或更充分的辦學經費而千方百計去努力。但是，辦學經費並不是大學

建設最關鍵的地方所在，它與塑造大學精神之間的關係更是相對外在的。

北大1949年前辦學經費最困難的有兩個時期：一個時期是從1919年到1932年7月政府頒布《整頓教育令》以前，政府時常拖欠應撥給北大的教育經費發生；另一個更為艱苦的時期是從1937年到1945年的西南聯大時期。1919年以前，教育經費基本可以勉強維持；而1932年到1937年則是教育經費不僅按時發放而且逐年增加的黃金時期。然而，北大精神的開創時期即蔡元培主校的1917年到1923年就大半處於基本教育經費無法得到保證的時期中；而辦學經費極為困難、教授生活異常清苦、辦學設備簡陋之極的西南聯大時期則是北大辦學成果最為輝煌的時期之一。蔡元培和蔣夢麟等人1923年曾提出辦大學有「三要」：圖書儀器要豐富；教授待遇要優厚；學術自由要保障^④。在這三個要素中，前兩條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還是在於第三條——只有創造出學術自由的氛圍，才能締造出健康的大學之魂。

3、大學與學生運動

任何一所大學都可能面臨如何處理學生運動的難題，而對於社會動盪、國勢衰微、政治腐敗、風雨如晦的近現代中國來說，學生運動更成風起雲湧之勢，因此，如何擺平大學自由與學生運動之間的關係，更考驗中國大學校長的智慧。蔡元培曾經為學潮而多次請辭。我們考察他對學潮的一般態度和處理方式，可以歸納如下：事前勸阻，事中保護，事後辭職。勸阻是因為他認為學生運動與他所謂大學即研究學問之地的宗旨不合，因此他不支持學生運動。保護，是指他

本於對學生的愛護，不僅自己不對學生採取嚴厲的處分，而且還會盡力營救被捕學生領袖，並盡可能阻止政府迫害學生領袖。辭職，一方面是個人對此完全負責的表示，以保護學生和學校；另一方面則以此繼續對學生勸學。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蔡元培關於他的請辭有過多種說法，表明了他非常矛盾的心態。就對政府的說法而言，他先是因自己對學生約束無方而請辭，但隨後他又發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說明他實際上是因為大學無法自治，掛冠而去的。就對學生的說法而言，他一方面是接受了別人的勸說，以自己的先行辭職而換取政府對參與運動的學生的寬大或豁免，另一方面又在7月23日的〈告北大學生暨全國學生書〉中以自己的一貫立場勸戒學生，蔡元培語重心長地提醒學生：政治問題因緣複雜，今日見一問題，以為重要，進而又會看到還有比此更重要的問題，以此往復於政治問題中，則無法盡瘁學術，使大學為最高文化中心，以定中國文明前途的百年大計。學生若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在蔡元培改造北大前，學生為升官發財而來就學，這是蔡元培要力圖改變的校風；而自五四運動以後，學生多為政治運動所吸引，這也是蔡元培所深為憂慮的。我在對清末學堂的研究中^⑥曾經指出：學堂學生的「反體制衝動」實際上是士紳慣習的一種特殊變形，獨立的教育場域無法成型，則道統與政統的張力則無法重建。五四運動中北大愛國學生的心性當然不能與北大從前抱着做官夢的老爺學生相提並論，但我們無可否認，五四運動所承接和發揚光大的「反體制衝動」與蔡元培將北大塑造

1922和23年，北京國立八校爆發欠薪危機。蔡元培提出國立八校脫離與北京當局的關係，另組董事會來籌措資金。北大1949年前辦學經費最困難的有兩個時期：從1919-32年，政府時常拖欠應撥給北大的教育經費發生；另一個更為艱苦的時期是從1937-45年的西南聯大時期。

北大在蔡元培治校時期能夠保持政府對大學的經濟支持與減少政府對大學的政治干預之間的大致平衡，能夠保持學生對參與政治運動與學術研究之間的大致平衡，能夠在相當大程度上獲得自治，幾乎都仰賴於蔡元培個人的影響力，即蔡元培的「卡里斯馬效應」。

為有獨立學統的場域的努力存在着張力。建立獨立而又厚實的學統以從根本上制衡政治，而不為政治一時所牽，這正是蔡元培之所以一貫對學生運動抱着保守態度的原因所在。

1922年10月北大因為經費短缺，要求對學生的講義進行收費，因而引發了一場校內學生風潮。蔡元培不僅以自己的氣勢震懾住了鬧事學生，最後還以辭職表示抗議。有人認為蔡元培這是小題大做，而蔡元培則認為收費問題本身事小，而學生此種放棄人格、精神墮壞的表現則是大學精神建設的大敵，不可不重視。「因為破壞的原因，起於外部的，還容易對付；起於內部的，對付較難。內部破壞的原因，在物質方面的，尚易挽回；若在精神方面，就不可救藥了。」

4、蔡元培的「卡里斯馬效應」及其後繼者

自從蔡元培將研究學理確立為大學的宗旨以來，大學在外部關係上受到三個方面的制約：政府既不時在政治上對大學自治橫加干涉，又經常不能提供辦學的基本經費；而學生則常常因為政治上的失望和對革命的熱望而投身於政治運動中。這其中最嚴重的因素是政府對大學的政治干預。如前所述，蔡元培對這些因素特別是政治干預問題力圖從這樣三個途徑來加以解決：個人影響力、校內制度建設、國家教育制度建設。在這三個途徑中，個人影響力的實際作用最為顯著；校內教授治校制度對校長權力的制衡則是不穩定的；而他想使國家從政治制度上確保大學自治的努力，則基本宣告失敗。因此，北大在蔡元培治校時期能夠保持政府對大學的經濟

支持與減少政府對大學的政治干預之間的大致平衡，能夠保持學生對參與政治運動的熱情與對學術研究的傾心之間的大致平衡，能夠在相當大程度上獲得實際上的自治，幾乎都仰賴於蔡元培個人的影響力，這即是我們所說的蔡元培的「卡里斯馬效應」。因此，我們才更明白，蔡元培這位後世所謂的「教育神」為甚麼屢用辭職來調整大學的外部關係。蔡元培本人並不是沒有意識到這種效應對於大學自治來說是脆弱的，但是他個人卻無力促使這種效應帶來制度上的革命。因此，就難免出現人去政息的情況。

在蔡元培之後長期主持北大校務的先後有蔣夢麟和胡適兩位。先就蔣夢麟來說。蔣夢麟是深得蔡元培信任的人，他長期輔佐蔡元培治校，在蔡元培名義上主校の後五年就是由他實際主持校務，1931年後又擔任北大校長一直到1945年，是北大歷史上任校長一職最長的人，對大學精神的建設有諸多重要貢獻。然而，蔣夢麟更多是一個將才而非帥才。他擅長處理具體事務，但在辦學的氣象、眼界和胸襟上要遠遜於蔡元培。比如，他被委任為北大校長後，一上任就提出「校長治校，教授治學」，使蔡元培曾努力推動的教授治校制度不復存在。

再就胡適來說。胡適是蔡元培後繼者中在大學理念與蔡元培最接近的，也是繼蔡元培之後名聲最響的北大領導人。但胡適一生在辦學實踐上更能體現他對大學自治的追求的，並不是在他的北大校長任內(1945-49)，而是在他的中國公學校長任內(1928-30)。他在主持中國公學校務時，學校不掛國民黨旗，不上總理紀念週，這在其他受所謂「黨化教育」影響日深的大學幾乎是絕無僅有。雖然他後來

被迫辭職不是因為辦學而是他個人的
一篇政論文章，但這次受挫對胡適的
教育實踐還是有一定影響。固然，他
在接任北大校長時提出要繼承蔡元培
在北大時的自由精神，但他在北大辦
學上已經很少政治上的出格行為了。
他在個人操守仍堅持將教育與政治分
開，多次拒絕政府要他出任要職的邀
請，但是，他主持北大工作的重點已
經從謀求超脫於政治干預的大學自治
轉向了擺脫西方奴役的學術獨立。胡
適在整個文化思想上的影響要比蔡元
培廣泛得多，但他在推進北大自主辦
學上的影響則不及蔡元培深遠。胡適
個人以其自由主義學術大師之身在當
時的中國學術界具有卡里斯馬效應，
但他在北大校長任上卻並不具有蔡元
培那樣的卡里斯馬效應。當然，胡適
在北大自治上作為不大，也與他任期
較短等因素有關。

二 北大學術自由的 制度實踐

美國弗蘭克福特 (Felix Frankfurt)
法官對大學的基本自由的內涵曾有一
個比較經典的闡釋：「根據學術理由
來自我決定：誰可以當教授；教甚麼
；應該怎樣教和誰可以被准許入學。」^⑥本節即根據這四個方面來分
析北大是如何運用學術自由的理念來
建立中國自己的學術新傳統的。

1、教甚麼？

(1) 學術分立

蔡元培上任時學校仍為「學而優則
仕」的傳統理念所籠罩，北大作為最
高學府則被視為奔向官場的直通車或
撈取錢財的終南捷徑。蔡元培來北大

後，首先將研究高深學問確定為大學
的宗旨，進而又具體區分了學與術：
治學者為大學，治術者為高等專門學
校，「專門學校是造就人才，應社會之
需要；大學則以研究高深學術滿足智
識慾為目的」。在蔡元培看來，大學不
是以職業教育為歸依的，它不是養成
資格的場所，也不是販賣知識的地
方，而是旨在培養學生研究真理的興
趣和致力學術的人格。鑒於法、商的
學理源於文科，醫農工各科的學理源
於理科，因此，蔡元培為北大確定的發
展原則就是：擴充文理，截止工科，
將商科歸併入法科，並預備將法科獨
立出去(最後一點未能實現)。工商法律
等科最易為學生當作升官發財的階梯，
北大學風最敗壞的往往也集中在這些
學科。裁減、撤併這些學科對於整飭
北大學風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2) 文理交融

蔡元培認為哲學必根植於自然科
學，而理科學者最後的假定也往往牽
涉哲學。為此，蔡元培撤去了文理法
三科的界限，而是設置了並立的十四
個系，在系與系之間教授能夠流動，
習文科者必須兼習理科的一種，而習
理科者也必須兼習文科的一種。

(3) 自由選科

蔡元培為了落實他在1912年任教
育總長時就在〈大學令〉中提出的「培
養碩學閥材」的目標，在北大本科教
育中將年級制改為選科制，並進一步
實行課程改革，使學生能夠不拘於專
業，而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自由選
習。全校所有本科生一年級不分系
別，其課程分成兩類：一類為共同必
修課，另一類選修課分為五組。後三
年的課程除必修兩門外語外，其餘全
部為選修課，只是需要在一個系及相
關係選修三十至四十個單位。

蔡元培上任時，傳統
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未
破除，北大作為最高
學府仍被視為奔向官
場的直通車或撈取錢
財的終南捷徑。而在
蔡元培看來，大學旨
在培養學生研究真理
的興趣和致力學術的
人格。因此，他為北
大確定的發展原則就
是：擴充文理，截止
工科，將商科歸併入
法科，並預備將法科
獨立出去。

蔡元培治下的北大在課程和學制上追求貫通中西。他積極引進西方的學制和文化，但最後的目的是求得中國學術的自主發展，而不是淪為西方教育的附庸。他對中國文化的基本態度是：反對尊孔讀經，但支持整理國故。1922年創建的國學門是第一個與歐美學術抗衡的國學研究「根據地」。

(4) 中西貫通

北大在蔡元培改革前在學制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自開辦到1911年，學制主要模仿日本，但教學方針是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西學基本上是裝飾品，中學倒還有點研究院的性質；第二個階段是自1911年到1917年，中學退為裝飾品，西學的地位雖然上升，但只是處於販賣知識的狀態，而談不上研究學理；只是在形式上搬用西方的體制，但西方大學體制最核心的東西——追求真理的學術自由精神卻完全付之闕如，倒是科舉的毒魂附着在身。

而蔡元培治下的北大在課程和學制上追求的則是貫通中西。他對西方的學制和文化是積極引進的，但他的引進以學術自由為核心，其最後的目的是求得中國學術的自主發展，而不是在形式上對西方亦步亦趨，或淪為西方教育的附庸。

蔡元培的改革主要以德國大學為參照，但他很少明確援引德國大學來為自己的改革主張辯護。這是因為他對德國大學觀念的接受，重在其學術自由的基本精神，而不在其具體原則；重在消化，而不是機械搬用、為其所同化。他只是在極特殊的情況下，才會使用諸如「仿世界各大學通例」這種說法，來回擊保守派的指責。但是仿世界大學的通例並不是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指向所在，他援引通例完全是為了解決中國自己的問題，是為了清除科舉的遺毒、急功近利的思想、學術專制主義觀念尤其是舊傳統對新思想的排斥。當時引進外來觀念被視為一種時髦，北大留學歸來的教師往往成為相應國家文化的鼓吹者，蔡元培對此深惡痛絕。他在北大積極推進研究所的建立，就是為了推

進學術獨立的進程。在蔡元培的影響下，胡適1947年在北大校長任內的一個重大舉措，就是提出了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主張國家集中最大的力量在十年內培植起五到十所成績最好的大學。但所謂「成績最好」，目標並不是按照世界一流大學的通行標準來改造這些大學，而是使之成為中國學術獨立的根據地^⑦。儘管這個計劃因為政局變遷而未能實現，但它讓我們看到了蔡元培和胡適那兩代真正稱得上教育家的北大校長的大氣象。

而另一方面，蔡元培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吸收和發揚也貫穿了學術自由的精神。他對中國文化的基本態度是：反對尊孔讀經，但支持整理國故。清末民初最早的國學倡導者，出發點並不在研究而在保存，以養成國民的愛國心，所以往往抱殘守缺，政治關懷明顯高於學術追求。而胡適1919年提出的「整理國故」則是要吸收歐美現代學術的方法，擴展視野，建立規範，創造出「適應新潮的國學」。這一點深為蔡元培所認同。因此，蔡元培在北大對國學建設的促進有兩個鮮明特點：一是把國學真正變成一門學問來研究；二是利用西方科學方法來研究國學。1922年1月，北京大學創建了國學門，這既是在中國現代大學中最早以歐美研究機構為模式建立起來的研究所，也是在「學術獨立」的呼聲下第一個與歐美學術抗衡的國學研究「根據地」。

2、誰來教？

教師的聘任、解聘以及受聘教師所享有的言行自由是學術自由的核心，也是蔡元培對北大改革最重要的方面，需要詳加考察。

(1) 聘任(解聘)標準

蔡元培在用人政策上說得最為詳盡的是1919年9月20日在北大第二十二學年開學式上的演說。他說：「延聘教員，不但是求有學問的，還要求於學問上很有研究的興趣，並能引起學生的研究興趣的。」^⑩這可以說就是當時北大聘任教師的三條標準：學有專長、獻身學術研究的興趣和善於引導學生的能力。這三條無疑都是從學術本身出發確定的標準，是服務於大學的宗旨——學術研究的。另外，鑒於他到任前北大學生的當官之意遠勝於向學之心的狀況，蔡元培特意對教師資格作了一項規定：「為官吏者，不得為本校專任教員」，以免學生通過官師的援引去做官。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標準都不構成蔡元培聘任教師的阻礙。蔡元培所謂的「兼容並包」政策的一個具體表現，就是在選聘教師上根本不為那些非學術的聘任標準所拘。我們以下幾方面來看一看蔡元培突破過哪些非學術的標準。

文憑。文憑可以成為辨識人才的參考要件，但並不是蔡元培選聘教師的主要標準。對於傑出的人才來說，有無相應的文憑都不構成他應聘北大教師的障礙。最典型的例子是蔡元培對僅僅中學畢業的梁漱溟的聘任。

資歷。北大教師當時並沒有等級森嚴的職稱制度。教員分為教授、講師和助教三種。教授與講師均授課，助教不授課；教授與助教為專任，而講師為兼任或特約，按講授鐘點付薪。講師並不比教授低一級，只是非專任或僅開一門選修課而已。所以，在北大上課的專任教師統稱教授。當然，在教授之間所給付的薪水還是有差別的，但這種差別主要不是因為資歷，而是因為學術水準和貢獻。

新舊。蔡元培聘任教授只問學問功力，而不問思想新舊和政治立場。他的名言是：「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⑪最典型的例子是激進派陳獨秀和保守派辜鴻銘的同時被聘。不過，我們要注意的是，蔡元培並不想把大學變成政治立場的競技場。他認為北大可以提倡學術思想流派之爭，可以容忍教師個人的政治歧見，但不應該把這種政治意見之爭引入課堂。比如他聘請辜鴻銘不是請他講政治而是請他講英國文學；他聘請劉師培也不是請他講政治而是請他講中國古典文獻。

土洋。在蔡元培那裏，人才與是否留過洋並沒有必然關係，他聘請教授只考慮其本身的學術水平，而不考慮其所受教育的土洋背景。蔡元培最早的解聘對象就是有洋學位、卻無真學問的洋教員，雖外交部企圖干預，蔡元培也堅決頂住了壓力。

私德。中國傳統文化中為學與為人不可分，師識與師德不可分。有人認為蔡元培主持北大時完全將師識與師德分離開來，只問學識不問德行。這是一種過於簡單的說法。蔡元培對此問題的完整說法是^⑫：

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艷之詩詞，以納妾、狎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

我們從中可以看到蔡元培對待教師的三種態度：努力提倡教師都按照進德

蔡元培主政北大時聘任教師的三條標準為：學有專長、獻身學術研究的興趣和善於引導學生的能力。另外，鑒於他到任前北大學生的當官之意遠勝於向學之心的狀況，蔡氏特意規定為官吏者，不得為專任教員，以免學生通過官師的援引去做官。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標準都不構成蔡元培聘任教師的阻礙。

會的要求不斷提高自己的德行修養；寬容那些有才學、雖德行有虧但不誘學生與之墮落的教師；對於學術荒疏且引誘學生一起墮落的人，則不為學校所容。這實際上是區分了作為教師的公德和私德，其根本的分界線就在於與學生的關係。一個有學問的人在私德上存在缺陷，尚不影響他在北大的被聘任；但如果在公德上存在問題，可能就會觸及北大所賦予教師的言行自由的底線了。

(2) 聘任制的具體運作

從常識上說，關係應該是妨礙中國大學的學術聘任的主要障礙，然而，在蔡元培聘任教師的過程中，因各種關係而來的推薦人選卻恰恰是選聘教師的主要人選。那麼，蔡元培如何能夠保證建立在推薦基礎上的聘任制能夠往兼容並包的良性方向發展呢？

首先，他以開闊銳利的眼光和不拘門派的公心開創多元化的學術格局。無庸諱言，蔡元培初到北大時是以浙江同鄉和章太炎弟子為核心幕僚的，其中湯爾和與沈尹默是在用人上對蔡元培影響最大的兩個人。蔡元培雖然對一派有所借力，但他行事從不從派系利益和小圈子的角度來考慮問題，而是有着開創多元化學術格局的獨特眼光和公心。所以，太炎弟子圈在北大勢力最大，但文科學長卻是《新青年》集團的領軍人物陳獨秀。此外，蔡元培一面為非太炎弟子的舊派名家劉師培和陳漢章等保留了教習，另一面又還聘請到了非《新青年》集團的另一新派文化領袖人物——《甲寅》雜誌和《甲寅日刊》的創辦人章士釗。這樣，蔡元培就奠定了一種新學舊學交錯、土派洋派共存、留日本留歐美並重的格局。

其次，不偏聽偏信。蔡元培雖然相信他所重用的這些精英在推薦人選

上的公心，但他並不完全依賴旁人的推薦。他在耳聽後還要進行眼識，這即是對被推薦者的文章或著作進行鑒別。事實上，這才是蔡元培決定是否聘請最關鍵的步驟。比如，梁漱溟經教育總長范源廉介紹，帶着他在《東方》雜誌上發表的〈究元決疑論〉去見蔡元培時，蔡元培說已經讀過這篇文章，並因此起意請他到北大教書。後來梁漱溟離開北大推薦熊十力替代他的教習時，蔡元培也是因為此前已經讀過熊十力的《熊子真心書》並非常欣賞，因此對梁漱溟的推薦才慨然應允。蔡元培作為一位偉大的教育家，其最基本的素質就是知識非常淵博，視野非常開闊，思想嗅覺非常敏銳，因此，他能夠發現和凝聚大批一流的人才。

再次，蔡氏在工作中既群策群力，又最後把關。蔡元培作為一校之長，不可能具體負責每個教師的選聘情況。除了他所看準的學術思想領袖人物和傑出教授的聘任工作由他親自去做之外，在聘任其他教師時，主要還是依靠集體的力量，尤其是倚重教授們的共同推薦。1920年，北大在校行政會議下建立了專門的聘任委員會，負責協助校長審查將聘任的教師任職資格。

最後，蔡元培也努力推動建立終身教職體制。他在對北大教師隊伍進行改革時，並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樣激進。他所解聘的教師限於三類人：在北大蒙事的外國教員，在北大兼職的官僚，個別學問和人品都極差、影響極壞的專任教師。至於許多不夠水準的專任教授，蔡元培更多是通過順其自然（如年老退職、主動辭職）的方法來淘汰的。他對師資隊伍的要求主要是通過選聘一批全新形象的新教師體現出來的。而在重點把好了進人關

蔡元培初到北大時是以浙江同鄉和章太炎弟子為核心幕僚的，但他行事從不從派系利益和小圈子的角度來考慮問題。所以，太炎弟子圈在北大勢力最大，但文科學長卻是《新青年》的領軍人物陳獨秀。另一面又還聘請另一新派文化領袖人物——《甲寅》雜誌創辦人章士釗。這樣奠定了一種新學舊學交錯、土派洋派共存、留日本留歐美並重的格局。

以後，蔡元培又通過實際上的終身教職來使教師能夠安心從教和研究。北大當時所聘任的教授一般在第二年獲得續聘後即無任期限制。

1923年蔡元培、蔣夢麟等人參與籌辦杭州大學，也體現出在中國大學推行終身教職體制的具體設想。在由蔡元培主導、蔣夢麟執筆的〈杭州大學章程〉^①中對教職員的任期規定是：正教授（相當於今日的講座教授）任期無限；教授初任三年，續任無限期；輔教授（相當於今日的副教授）初任一年，續任三年，再續無限期；講師和助教初任一年，續任一年至三年，續聘得續任，特別講師（兼職講師）以所授科目的時間長短為標準。顯然，在這裏，終身教職的起點是定在輔教授上的，他們經過兩次評審（任職一年後和四年後）合格後即可獲得終身教職。

3、怎麼教？

(1) 研究與教學的結合

蔡元培認為理想的教師應該是既教且學，將研究與教學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選科制的推行為教師按照自己的研究興趣和成果來開課創造了條件。教師可以隨時把他們研究的新成就充實到課程的內容裏去，也可以隨時用在講課時所發現的問題發展他的研究。教師講起課來覺得心情舒暢，不以講課為負擔；學生聽起課來也覺得生動活潑，不以聽課為負擔。

(2) 講授與自學的結合

在北大改革前，學生的學習焦點在教師的講義上。蔡元培對北大教學改革的一個重點，就是強調要減少教師講授和學生對筆記的倚重，加強學生的自學研究。胡適甚至提倡進行完全自由的教學形式，無須固定的上課

形式，而是由學生找導師，開書目，進行自由研究，質疑問難。

關於這一點改革，涉及到如何在大學體制中發揚中國文化傳統的問題。錢穆曾經這樣談到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對人不同的塑造方式。中國的書院教學講求身心修養和德操氣節；教學中以自學為主；注重因材施教，師生多情感交流。而西方大學體制重視的是知識追求；教學中以講授為主；分班按點統一授課，師生距離較遠^②。從某種意義上說，在科舉被廢時，本與科舉宗旨有所不同的中國傳統書院也一併被新式學校所取代，這多少是一個歷史的失誤。後來蔡元培也承認學校確有一些不及書院之處。但是，是在現代大學體制內融會和保留書院制的某些精神，還是在現代大學體制外發展獨立的書院，這是蔡元培、胡適、梅貽琦與章太炎、梁漱溟等人在教育路上的分歧。事實證明，在現代社會堅持走後一條路，至少因為畢業生沒有文憑而導致的出路問題，就會變得難以為繼。事實上，大學體制與書院精神並不是毫無融會之處。西方自由教育傳統與中國所謂的「眼學」（讀經典）傳統就頗有神似之處，胡適1923年也感慨中國古時的書院與英國大學的「道爾頓制」在自修研究（經典）的精神大致相同。因此，蔡元培通過在本科中推行選科制並進行強調自學讀書的教學改革，通過兼採中國書院與西方研究所之長來設立研究所，這些都是將西方大學體制與中國文化精神結合起來的良好嘗試。

(3) 不以聽課多寡論高低

為了保證大學學者的思想自由，蔡元培並不以學生聽課人數的多少來為教師的價值定位。他認為，「一種講義，聽者或數百人以至千餘人；而

蔡元培認為理想的教師應該是既教且學，強調要減少教師講授和學生對筆記的倚重，加強學生的自學研究。胡適甚至提倡進行完全自由的教學，無須固定的上課形式，而是由學生找導師，開書目，進行自由研究，質疑問難。為了保證大學學者的思想自由，蔡元培並不以學生聽課人數的多少來評判教師的價值。

今日雄心勃勃的大學改革家明裏暗裏以蔡元培自期。然而，當我們認真考察了蔡元培改革北大的這一段歷史後，會發現蔡元培改革的實踐方向與今天某些人的大學改革方向南轅北轍，蔡元培改革時的宏大氣象和長遠眼光，與今天某些人改革大學時的偏狹胸襟和功利心態構成鮮明對照。

別有一種講義，聽者或僅數人；在學術上之價值，初不以是為軒輊也。」^⑩有時候，北大用最重的待遇禮聘來某些身懷絕學的學者，一年只開一門課，每星期講一兩點鐘，只有一個學生來聽，但北大仍處之泰然。

(4) 不以考試相迫

為了使學生的焦點放在求學本身上，北大還改革了考試制度。不僅減少考試次數（一年僅一次），而且廢除了全班統一考試，只進行按照自願所選學科的考試，甚至還可以根本就不參加考試，只要你不想要那紙畢業證書。

4、誰可以來學？

在舊學制中的高等學堂撤銷後，各大學便自辦預科。蔡元培對北大預科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將預科從三年減為兩年，並分屬北大各科；課程由本科教員兼任，並進行改革。預科雖然分屬各科，但預科的共同必修課反而有所加強，只不過這些必修課並不是各專業課程的拼湊，而是跨越專業界限的通識課。只有全部完成這些通識教育，才能進入本科教育。

蔡元培在1917年到1923年對北大的改革，為塑造中國的大學精神開闢了一個宏大深遠的方向。今日雄心勃勃的大學改革家及其熱情洋溢的支持者頗喜歡拿蔡元培來說事或勵志，甚至明裏暗裏以蔡元培自期。然而，當我們認真考察了蔡元培改革北大的這一段歷史後，也許就會發現，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實踐方向與今天某些人的大學改革方向是如何的南轅北轍，蔡元培改革北大時的宏大氣象和長遠眼光又是如何與今天某些人改革大學時的偏狹胸襟和功利心態構成鮮明對照的。

註釋

① 學術自由並不是西方大學唯一的理念，除此之外，還有學術自治、學術中立和學術責任等理念，但學術自由是最核心的理念，其他理念都圍繞着學術自由而生。所以，我們用廣義的學術自由來指涉包括學術自治在內的西方大學理念。而下文所說的（中國大學的）學術獨立則與西方學界所說的學術自治不同，它特指的是非西方國家在大學制度中如何保存發揚本國文化，以及在研究教學中如何面對本土現實歷史狀況的問題。

② 蔡元培在北大校長的任職時期是從1917年到1926年，但自1923年起蔡元培就長期滯留國外，校務實際上由蔣夢麟主持。蔡元培自己在回憶中也說：「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載《蔡元培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③⑧⑨⑩⑬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58；344；271；271；574-55。

④⑪ 曲士培編：《蔣夢麟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頁230-31；242。

⑤ 應星：〈社會支配關係與科場場域的變遷〉，載楊念群編：《空間·記憶·社會轉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頁269-70。

⑥ 博克（Derek C. Bok）著，徐小洲、陳軍譯：《走出象牙塔》（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頁41。

⑦ 姜義華編：《胡適學術文集·教育》（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166。

⑫ 錢穆：《中國現代學術論衡》（長沙：嶽麓書社，1986）。

應星 現任教於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教研室